

January 2012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es into the Poetry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hixi Qi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Qian, Zhixi. 2012.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es into the Poetry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1): pp.87-9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1/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旧学与新知的复杂交汇

——试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

钱志熙

摘要:在新的教学和研究体制中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汉魏六朝诗歌研究,体现出旧学与新知复杂交汇的面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一方面,对它的研究有丰厚的传统积淀。另一方面,学者们从进化论、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等新的文学观念中获得了重新建构、阐释诗歌史的话语体系,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或重新阐述了那些被旧文学史观所忽略的事实,形成了像乐府诗研究这样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事实本身也不断地调整研究者的观念与方法,促使一些学者更加全面地认识诗歌史的整体,且不断与旧学呼应,甚至出现向传统方法的回归,旧学与新知、述与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不失为著述文学史的良好方法。这表明,文学史研究如何融汇中西,沟通新旧,在继承古代丰富的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有力的发展,是今后的文学史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史 汉魏六朝诗歌 文学观念

作者简介: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qian-zhixi@pku.edu.cn

Title: A critical Review of Researches into the Poetry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the poetry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which have developed in a new teaching and academic system, show a combination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d modern approaches and therefore have some representative significance in ancient literature studies. There is a long tradition of such studies and scholars have got new discourse from such fresh literary concepts a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to reconstruct or interpret the history of poetry, and discovered or discussed some new facts, thus making studies of yuefu poetry attract considerable academic attention. As such studies develop, facts begin to readjust scholars' notions and approaches and urge them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poetry holistically and in a way that resonates with and even returns to classical scholarship. A combination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d new approaches is a good way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poetry. It is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of literary history to reflect on how to integrate the classical and the modern, the west and China in their studies.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poetry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literary concepts

Author: Qian Zhixi, Ph. D., is a professor with the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Postal Address: No. 5, The Summer Palace Road, Haidi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871. Email: qian-zhixi@pku.edu.cn

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汉魏六朝诗歌史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诗经》与楚辞,在诗歌史上自然是居于最崇高的位置,备受历代诗人与诗歌研究者的关注。但中国古代最为繁荣的文人诗歌系统,是从汉魏的乐府中直接地发展出来的,而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作为文人诗歌传统的奠定与发展的早期,也是后来唐宋诗歌的重要渊源。因此,汉魏六朝的诗歌在文人诗史中的经典地位虽不如《诗经》、楚辞,但其对诗歌史的实际的影响,是远超过它们的。实际影响的巨大,造成了它的经典地位,也引起了历代诗人、诗论家对其进行较多的批评与研究,对汉魏六朝诗歌史进行局部与整体的建构的批评家也代不乏人。更重要的是,唐宋以降的各时代、各诗歌流派,都从他们自己诗歌创作思想出发,对汉魏六朝诗歌作出了一种群体性的批评。上述中国古代对汉魏六朝诗歌的批评、鉴赏、诗史建构,以及历代相续的汉魏六朝诗歌文献的整理,构成了传统的汉魏六朝诗歌史批评。在二十世纪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整体性的叙述,建构贯穿古今的文学史系统的学术工作中,对汉魏六朝诗歌史的整体评价、建构,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传统的影响以及新的文学史观的导引,二十世纪前中期的诗歌史研究,主要聚焦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歌、唐诗、宋词这几个诗歌系统,产生了很丰富的成果,同时也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总的来说,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既是一个新的学术发展进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继承。只是在一个新的学术文化环境中,尤其是新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下,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

诗歌史研究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其中旧学与新知非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有时能够调和,有时又显得异常的矛盾。各种有关汉魏六朝诗歌史的新旧史观时而叠合,时而冲突;而最终决定其学术价值的,则是其对诗歌史事实的描述的准确程度,以及其对诗歌史发展趋势的揭示的深入与否。本着这样一种思考,本文尝试在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整体中叙述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进程。其目的不仅在于客观地叙述一段学术史,更在于通过这种回顾来思考今后本段诗歌史的研究应该如何发展。

汉魏六朝诗歌史的研究奠基于南朝时期。造成本期研究成就的要因有二,一是自建安“五言腾踊”(刘勰 66),文人诗艺术迅速发展,魏晋以降,成为文章之重心。二是哲学与史学的发达。其代表性的成果是像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研究的专著与史家的文学家传论、传序。南朝史家与文论家的文学研究,将零碎的、印象的、自发的、主观的文学批评,上升为一种综合的、深入的、自觉的、客观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初步成熟。当时之文章学,重心在于诗赋,所以上述文论的重心,多在诗赋之学。在诗歌史研究方面,最值得肯定的是钟、刘等人系统探讨诗史的源流演变,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文心雕龙·乐府》等篇。它们不同于后来的诗话、诗文评之处,一是有体系,二是有方法。钟嵘《诗品》不仅长于风格批评,善辨源流演变,而且对诗人的个性、生活及社会背景与其创作的关系也有所揭示。刘勰对诗歌史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有所揭示。同时,南朝各家的诗歌史建构,都有明确的分期、分段意识,他们对建安诗风、正始诗风、太康、元嘉等时期诗歌史发展阶段以及玄言诗风、山水诗风的描述,基本上奠定了汉魏六朝诗歌史的基础。

唐代对汉魏六朝的研究有两派,一派为唐初史家所著南北朝各史,继承南朝史家的矩范,继续对齐、梁、陈、隋的诗歌史作出叙述。一派则是诗人,他们在阐述其诗学主张的同时,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史做出一些重要的论述。所谓汉魏风骨、建安风骨、齐梁绮靡诗风等对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有奠定性作用的诗史概念,多出唐人。所以,唐人对于汉魏六朝诗的研究,虽然系统性成果不多,但实际的影响是很大的。像陈子昂的“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彩丽竞繁,兴寄都绝”(陈子昂 15)的观点,差不多是奠定了汉魏六朝诗歌史的基本评述标准。以李、杜、韩、白为代表的后继者,也都对汉魏六朝的诗史、诗家作出了他们自己的阐述。根据上面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的格局之奠定,在于南朝及唐代。

宋元时期的诗人与诗歌批评家,继唐人之后继续对汉魏六朝诗歌进行研究。这也与当时的诗歌创作有关系,因为虽有唐诗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但汉魏六朝诗仍然是宋人很重要的借鉴对象。严羽《沧浪诗话》中的所说的“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严羽 1),即是反映了苏、黄以来的宋代主流诗学的观点。宋代的一些杰出诗人,在比较全面地掌握唐诗艺术之后,对唐诗由之所出的汉魏六朝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唐诗固然是诗歌艺术的高峰,但汉魏晋宋的诗歌更为高古自然。陶渊明在宋代地位的提,即与此种诗歌史观有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人在唐人之后,也对汉魏六朝诗歌史作出自己的判断与建构。宋代的诗学著作中,也有继承钟、刘的传统,对诗歌史作系统的论述的,如严羽《沧浪诗话》在概括历代体制流变时,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风格作了一些新概括,其《诗体》一篇所举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等概念,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大。

与钟、刘及南朝史家、唐初史家相比,唐宋诗人、诗话家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当代诗歌创作,是当世诗风之一部分,而自觉的、客观的学术观念的立场比较缺乏。但唐宋诗学家对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正在于在自身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凸显汉魏六朝诗歌的经典价值。宋人继唐人之后,继续阐扬汉魏风骨的经典价值,形成汉魏六朝诗史建构中汉魏风骨与齐梁绮靡相对的稳定的评价系统。当然,各流派的诗史观也是不一样,如中晚唐的齐梁体诗人通过对齐梁诗风的局部的学习,使得齐梁陈隋雕缛、绮艳诗风的价值得到了局部的肯定。而四灵诗派、江湖诗派因为以近体为主,所以也注意到作为近体之先驱的齐梁体的经典价值,所谓“玄晖诗变有唐风”(赵师秀 270),即反映此派的诗史观。

明清时期是传统诗学研究的成熟期,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及诗歌史的研究。复古诗学是这时期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主要支撑。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魏晋诗歌完成了它的经典化过程,南北朝诗歌也因为邻近的关系受到重视。在文献上的表现,是明代的诗歌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文献作了整理,出现了一些总集与选集,其中以冯惟讷《古诗纪》和张之象《古诗类选》为代表。一些重要诗人的专集的整理工作也在进行。在诗歌史的研究方面,明代的诗史研究开始体系化。虽然其基本的立意,仍然是为其当代的诗歌发展提供借鉴与依据;但成体系的研究著作出现了,其中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可为代表。这个时期一般的诗话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研究,也趋向于体系化,都从风格、体制的演变方面,对魏晋南北朝诗歌艺术做出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继南朝文论家、史家之后,又一个比较

自觉地趋向于客观研究的时期。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王闳运(湘绮)的《八代诗选》等唐前诗歌选集,也对建立魏晋南北朝诗的整体观具有重要的奠定作用。王氏借用“八代文”的概念,创造了一个“八代诗”的概念,对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王氏“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样一个八代诗歌划分,并且注重古体与新体之分,齐梁诗中列出“新体诗”一类,客观地展现出唐以前文人诗发展的历程。当然,就像明代汉魏六朝诗研究的成就与明代复汉魏之古的创作思潮相联系,王闳运的“八代诗”概念也是晚清崇尚汉魏诗风这一派的创作观念的反映。

从上面所述可见,在古代诗学研究中,汉魏六朝诗歌史是人们批评、研究得很多的一部分。相对于宋、元、明、清的诗歌史的缺少经典性的、权威性的建构而言,汉魏至唐代的诗歌史,古人已经作出了十分深入的阐述与系统的建构。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及其成就的取得,是和这个领域传统积淀之丰富分不开的。

二

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就其基本性质来讲,是在新的教学与文学研究体制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学。但是在这个新学中,又有以绍续旧学为主、部分地吸取新知的一派,与完全标举新学的观念与方法的一派。大体说,从清末到五四运动以前,是以前一派为主;五四之后,则是以后一派为主。

清末京师大学堂开“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等课程(陈平原⁹),开启了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体史的路径,其目的在于培养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至1917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开设“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课程,文学史的研究更加趋于系统化。同时全国各大学、师范学校、中学也都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纷纷编纂文学史。应该说,这是现代人文学科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端,但任教者多为原本工于词章、熟知中国古代文学与文体学源流的宿学。晚清各文学流派的名家宿学,往往成为这时文学教学的自然人选,如早期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有桐城派诸家(姚永概、姚永朴、林纾)、同光体诗人(陈衍)、以及源于永嘉学派、有着深厚旧学传统的林损等人。由此可见,新的教学体制下文学史研究的起点,最初并未割断与旧学的联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大学文学史的研究,是用新式的文学史体例,将传统的文学资料加以初步的系统化,类似于政治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在观念方面,西方的文学史观点也开始被研究者运用,如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区别、韵、散文体发生的先后次序,都带有新学的性质,成为后来文学史著述的重要观点。一些文学史家也尝试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下阐述中国文学,如光绪年间来裕的《中国文学史稿·绪言》,尝试在世界文学的整体中演述我国文学的特点(来裕¹⁰)。而在另一方面,晚清的学术与文学流派,也自然地对新式的文学史研究发生影响,其中文学流派对新的文学史研究格局的影响尤其大。即以诗学而言,桐城派与同光体对唐宋以下的近体诗系统比较重视,而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六朝派,则承续扬州学派阮元的文学观,侧重掘发六朝修辞至上的文学意蕴。此派直承南朝文笔说的纯文学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汉魏六朝的文学受到了充分重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解阮籍《咏怀》诗,初开上庠重视汉魏六朝文学的风气,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繁荣局面的开启者。但两家的观念深受六朝文章观的影响,以诗赋骈文等韵文为文,以散直单行为语体。在这种文学史观中的汉魏六朝诗歌研究,侧重诗歌的体制与修辞艺术,而汉儒以来强调诗言志(《尚书·尧典》)、诗歌吟咏情性(《毛诗序》)的诗学观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刘氏的文学观深受清代《文选》派的影响,强调传统的文笔之分,侧重于从修辞一端来定义文学,它在客观上符合六朝文学由朴趋雕、由质趋文的总趋势,对于这一发展趋势的揭示有一定的功用。但这种偏离情志本体的文学史观,在研究诗歌史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前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蒋鉴璋《中国文学史纲》云“夫灵性摇动,文学孳生,岂必藻饰华辞,始为优美?旷观今古,何世无才?若必以丽辞为文,将必以六朝为尚;刘申叔氏《中古文学史》成,续貂未覩,非无故也。”(蒋鉴璋⁵)同时,刘氏虽然对南朝文论家观点网罗甚夥,整有条贯,但对唐宋以下有关六朝文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极少涉及。这也可以见出刘氏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上,是专宗扬州学派的。刘氏对诗史的论断不多,其基本的方法,还是踵承钟、刘之学,重在辨别魏晋南北朝诗风、诗体之源流演变。如对于建安诗风,仅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有关汉魏诗史的论述,加以按语云“此节明建安诗体殊于东汉中叶之作。”又引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论魏氏三祖、陈王乐府一段,加以按语云“此节明建安乐府变旧作之体。”(刘师培19-20)又其论魏初诗歌与嵇阮诗的关系云“要之,魏初诗歌,渐趋轻靡,嵇、阮矫以雄秀,多为晋人所取法。”(刘师培44)又其论两晋诗体的源流云“晋代之诗如张华、张载之属,均与士衡体近,然左思、刘琨、郭璞所作,浑雄壮丽,出于嗣宗。东晋之诗,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惟许询、支遁所作,虽多玄言,其体仍近士衡。自渊明继起,乃合嵇阮之长,此晋诗变迁之大略也。”(刘师培62)又其论南朝诗体以用事为工云“齐、梁文翰与东晋异,而诗什亦然。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刘师培89)又其论梁代宫体,对南朝艳体源流亦有所揭示“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紵词》、《白铜鞮

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则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犹昌。(略)故初唐诗什,竟沿其体,历百年而不衰。”(刘师培 90-91)此种考辨诗风、诗体之源流的方法,上起钟、刘,至明代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臻于缜密。早期以旧学深邃之功见长、不欲率用新学观念的文学史家,多用此法,如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诸家,率用此法,各有所得。其实是传统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方法与干嘉朴学家注疏之法的结合。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此种文学史的著述方法已经近于绝迹。

五四之前的晚清文学史研究,可以说是旧学在新式的学术体制中寻求其表达的方式。除了以教学上流行的文学史的体制来演绎旧学之外,各家各派还在寻求各自的著作与研究的方式。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采用接近于《文心雕龙》的体制,上卷分“起源、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运会、派别、著述、告语、记载、诗歌”十二篇,下卷分“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刚柔、奇正、雅俗、繁简、疵瑕、工夫、结论”十三篇,以作者自身的深识,弥纶群言,其方法与刘师培正是异曲同工。其《诗歌》一篇,历叙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史在内的古今诗学流变,与清人鲁九皋的《诗学源流考》(郭绍虞)体制相近,稍后黄节作为北大讲义的《诗学》也与此相近。可见晚清诸家的诗史研究,基本上可以说引旧学之绪而扩大之。

事实上,五四之前的文学史建构,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的文学家式的文学史,个人与流派的创作经验、文学主张常常会强烈地支配着他们的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价值判断。但是他们的长处也是明显的,即能够深刻入理地揭示他们所关注的某些文学事实,并且予以充分的阐述。

三

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建构,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为界,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叙述与研究,基本上是在旧文学自身的体系内的叙述。虽然晚清以来,文学发生了某些变革,出现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运动,使得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与文学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从内部寻找解决的方法,希望在中国文学自身体制内辟一新境,在文体与语体上都是一遵古典文学之旧。黄遵宪自述其作诗宗旨“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黄遵宪 3)这种诗学革新,与中国古代文人诗的每一次革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造成二十世纪文学史观的巨大变化的,主要还是二十世纪自西方引进或在本土发生的各种新文化与文学观念。其中进化论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思想,对二十世纪文学史观的影响最为巨大。

进化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影响极大,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人物,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进化论。新文学之所以决然地否定旧文学,认为旧文学为死亡的文学,真正的勇气正是来自他们对文学进化论的信仰,并不简单地来自审美上的选择。根据适者生存的天则,他们认为旧文学已经完全不适应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是应该被淘汰的。同样,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早期的文学史著作,有不少直接援引进化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如1929年沈炳华为沈达材的《建安文学概论》作序,说“人类既是天天在进化的历程中不停的走着,自然他的心灵——文学,也就依这原则而日益扩展。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形与质,便时时显示其进化,文学史——无论是断代史或通史——的使命,就是记载文学的进化的历程,并在这历程中推出其因果关系,也如普通的历史或别的学术史一样。”(沈炳华)1930年,谭正璧编著《中国文学进化史》,更是直接以进化为文学的基本观察点了(谭正璧 1 2)。在这种史观的支配下,文学史研究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文学演变的脉络。

进化论文学史观表现在汉魏六朝诗歌史的研究中,就是二十世纪的诸家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力图建构一个诗歌史的发展谱系,认为从汉魏诗歌发展到唐诗,中国诗歌史是在完成着某种“进化”。中国古代诗学家也常常将唐诗看成是此前汉魏六朝诗歌史演化进程的一个完美结果“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沈德潜 1)在这一点上,进化论与之有相通之处,或者说这种传统的文学演化观,成为新进化论的一种传统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唐宋以来的复古派诗学家,又以《诗经》风雅颂、汉魏风骨为诗歌典范,建构起诗歌精神及其经典价值逐代衰落的考察诗史的方式,如白居易《与元九书》论风雅之道的逐代衰减,黄庭坚将诗史建构为“国风雅颂、楚人之言、后世诗人之辞”三部分(黄庭坚《胡宗元诗集序》卷十二),明清崇尚汉魏诗风的胡应麟等人对汉乐府、汉魏晋古诗的推崇,从一种理想的艺术精神的角度来建构诗歌史。本来诗歌发自人类讴吟的天性,原始诗歌经过长期的发展,到《诗》、骚的时代,达到了一种成熟。在《诗》、骚中,我们看到诗歌艺术精神的圆满实现,也看到沿袭《诗》、骚的后世文人四言诗、辞赋中,明显地向人工修辞的方向发展,而艺术的精神则有所坠失。同样,文人五言诗源于汉乐府,在魏晋时代就创造出建安风骨及阮籍诗、陶渊明诗这样的典范,情志与词采获得统一;而南朝以降的文人诗,则修辞艺术片面地发展,而情志及比兴有所坠失。这种情况,都表明所谓诗歌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非简单地利用进化论原理可以解释。作为一种文学史观的文学进化论,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的事实,有符合的一面,也有不完全符合的一面,它与中国古代的诗歌史观的关系也是这样。事实上,二十

世纪前期那种典型的进化论诗史观,虽然作为一种新方法风行一时,但后来的诗歌史家,很少简单地运用这种直接从生物学中搬运过来的进化论观念。但进化论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主流的文学史观,是带有复古色彩的,有文学今不如古的观点。这种今不如古的文学观,在特定的文学系统、文学史发展阶段中,是有一定的真理性的。但认为整个的文学史都是今不如古,则显然是有问题。

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一个表现,是在各时期的文学体裁中,重视新的文学样式,贬低旧的文学样式。这与中国古代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有一定的叠合之处。正是这种观念,使得汉赋、中古五言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的文学史序列得以确立。后起的文学样式,如戏曲、小说获得充分的肯定,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文学史的格局。正是在这种文学史格局中,元明以降的文学正统被散曲、戏剧与小说所取代,诗词、辞赋、古文被程度不同地忽略。魏晋南北朝文学原来是诗赋并重,某种意义上说,辞赋在当时文坛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研究格局中,诗歌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辞赋则被冷落了。多种文学史,对魏晋以后的辞赋多是一语不及。1947年出版的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一方面承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向以诗赋二者著称”,并且认为“单就赋的一方面说,这个时代的辞赋已经比汉赋进步许多了”;但另一方面,著者还是认为魏晋南北朝辞赋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多,“所以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的赋略而不谈,专门来讲这时期文学的主干部分——诗歌。”(胡云翼 73)这种对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忽略,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文学史著述与具体的研究中,是有普遍性的。表面上,魏晋南北朝诗歌受到了特殊的重视,但这种特殊重视是以忽略这个时期诗赋并重的文学原生态为代价的,这显然对于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的研究也是不利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随后一百年白话文学的发展,不仅使承传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学失去了正统的地位,而且也古代文学史划上了它的结束点。传统的文学教育重于作,而轻于研;重视经典作家的阅读,而轻视一般的文学知识与积累;其相关的文学研究的著作,要么重在文学原则与思想价值的阐述,要么重视具体作品的鉴赏与批评,再有就是对文体的研究,也是其传统文学研究积累丰富的部分。总的来说,古代传统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是以有助于创作为主要目的的,是为了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文学寻找借鉴,并期待发展出更加理想的未来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但随着现代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及文学教育的专业化、职业化,文学史日益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讲究现代人文科学的综合的研究方法的学科。也就是说,文学史研究日益客观化了。这种客观化,可以说是文学史学科发展中必然性趋势。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旧文学的否定,使得在一般的认识中,旧文学成了一种历史。这加速了文学史研究的客观化。从此之后,古代文学就被当作一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进程的“古代”的文学来看待。与从前的研究者是处身于那个活的文学发展进程之中不同,此后的研究者,则是面对着一个客观性的审美物的知识体系。虽然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研究者,我们与中国古代文学仍有一种属于思想文化传统的精神血脉的联系,但我们已经置身于“事”(创作之事)外。所以,文学史的学习与研究,就从以“能”为主的古代传统,转化为以“知”为主的现代传统。五四可以说是两种文学史研究方式的分界点。从此,文学史教材及文学史专著的质量标准,就在于叙述这个叫做文学史的客观的、审美物的知识体系准确与否,这也同样是文学史内部各段落、各单元的如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分体断文学史的质量标准。

在具体的文学史观上,五四新文学运动给中国文学史带来的影响更大。进化史观对新的文学样式的崇尚,与五四流行的崇尚平民文学、通俗白话文学,贬低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甚至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的人文文学也在相当程度上遭到贬抑。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就是这种文学观的代表作。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完全是他的白话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上的演示,本身就是白话文学理论的一部分。他利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成就,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文学,有基本与当时的语体一致的一种,又有与当时语体不一致的属于历代文人共同使用、不随着实际的语言变化而变化(或者说只有局部、少量的受当时语言的影响)的一种,后者即文言文。从文学的发生历史来讲,前一种文学(即胡适提倡的、褒扬的“白话文学”)常是后者渊源所自,如汉乐府为魏晋以降的文人诗歌的母体。而且从根本来说,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口传文学到书面文学的发展,不仅整个文学史是这样(钱志熙),各种文体也常常是这样的,如变文、小说、戏曲都经历过从口传到书面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历史上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民俗及民间文艺的重视,有助于揭示文学发生的真相,这的确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超越传统的文学史观的地方。这种文学史中,国风、汉乐府、南北朝新声、变文、早期曲子词、话本小说、金元戏曲、明清通俗小说等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一切发生古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民间及民俗性质、过去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在理论上都获得了最重要的研究价值。郑振铎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是继胡适之后,对俗文学的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做出更深入、系统地阐述的一部著作。

在上述文学史观与文学格局中,汉魏六朝诗歌史是很关键的一部分。本来在传统的诗学中,汉魏六朝诗歌就是极受重视的。而它作为中国诗歌史发展的前期,与歌谣及音乐舞蹈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新的文学史观重视歌谣、通俗文艺,总的来说,有助于汉魏六朝诗史上述发展特点的揭示。在新文学史观所建构的汉魏六朝诗歌史中,汉乐府诗、吴声西曲在诗歌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并直接促使了二十世纪汉魏六朝乐府文学研究的繁荣。但从另一

方面来说,汉魏六朝也是庙堂诗歌与文人诗歌创作成就显著的时期。尤其是从魏晋至南北朝、隋,可以说是文人诗创作系统从确立到繁荣的重要时期。虽然这时期的诗体多出於歌谣及乐章歌诗,但体裁与题材及各种诗歌修辞艺术的发展,都是在文人的手里完成。二十世纪前期诗歌史,对于上述文人诗的发展进程,是注意得不够的。不但这个时期的雅颂歌曲是基本上被否定了,文人创作中较多地反映纯粹的文士意识、讲究修辞的一派,也受到贬低。被晚清同光派诗人沈曾植奉为三关的元嘉体,胡适用“元嘉文学毫无价值”一语来下判断。至齐梁之间逐渐兴起的用典艺术,则直斥为“用典的恶风气”,而东晋南北朝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山水文学成就,在这种文学史观下,也被忽略。胡适之在该书的引子“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中称:第一,“要人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第二,“要人知道白话文学即是中国文学史”。这两个断语,如果说前一断语还基本上是正确的,后一断语则显示出极大的偏差。虽然如前所述,多种文学样式常始于语体,并且语体文学本身也有它的极高价值,但是中国文学史主体仍是由文人文学、文言文学构成的。

事实上,五四之后形成的这种新的诗歌史观,恐怕也还是接受了以诗骚、汉魏、盛唐为正宗、唐以后无诗等传统诗歌史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分整个诗史为古代诗史、中代诗史、近代诗史三期,古代诗史为《诗经》、《楚辞》、汉乐府,中代诗史三国诗、六朝诗、初盛唐诗、中晚唐诗,近代诗史为唐五代词、北宋词、散曲及其他。两宋以来古近体诗系统,完全被删略了。闻一多的诗歌史研究,也是以诗经、楚辞以及从建安到盛唐的这一段为主。一些在五四新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史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这种重视原典、原创的文学史观的影响,其实是诗骚正宗、汉魏盛唐正宗的传统诗史观在新文学氛围中的一种变形。如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上述的倾向,其对宋以来的古近体诗的评价,明显地偏低。这种诗史与传统的崇唐抑宋的诗史观有一定的叠合之处,但其审美思想与理论的前提则是来自五四新文学观,两者之间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应该说,从五四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上述诗史观一直是主流。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由于重视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等范畴的引进,宋元明清古近体诗中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像龚自珍这样的具有积极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客观上打破了上述有巨大偏颇的诗歌史,使宋诗、明清诗等中国诗歌史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但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史观的真正突破,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随着文学价值观的多元化,诗歌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过了前八十年。宋元明清的诗、古文辞才开始被关注,那种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学史建构方式才开始得到局部纠正。

一些具体的属于新文学运动范畴的活动,也对诗歌史观产生影响,如北大顾颉刚等的采歌谣运动,对《诗经》及汉乐府、南北朝乐府新声的歌谣体性的认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顾颉刚的《诗经》研究,就带有歌谣学的色彩。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在古代诗学家那里基本上被遮蔽了的歌谣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重要价值,在二十世纪的诗歌史研究中得到了凸显。五四以来对民间文艺的整体重视,对于文学史中与民俗和民间娱乐关系密切的变文、戏剧、小说的研究,也起到推动作用。一些成长于三、四十年代,研究活动持续到五、六十年,甚至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其教学与著述的文学史中,都给歌谣、戏曲及一般的通俗文艺形式以较重要的位置。表现在诗歌史研究中,则是重视诗歌与音乐歌舞的关系。如曾经求学于北大的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是作者在台湾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其文学史观却是渊源于北大一派的。在该书《第一章、中国文学的起源》中,作者认为“研究文学的起源,不能抛开跳舞与音乐,因为在原始时期,文学、跳舞、音乐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本书在《诗经》、乐府、词曲的部分,都特别重视其原生的音乐体制,这可以说是本书与同期产生的大陆的各种文学史的特色。

从这个意义上看,二十世纪的诗歌史观是很复杂的,有着多方面的渊源。具体地落实到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来说,传统的崇汉魏、轻齐梁的观念,与新文学的重视歌谣乐章及平民文学的观念,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有叠合,也有矛盾。并且我们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研究者虽然也受上述诸种诗歌史观的影响,但更多地贴近诗歌史本身,梳理出比较接近诗歌史实际的发展进程的线索。当然,像胡适这样极端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后来的学者并没有完全接受。如1932年出版的沈达材的《建安文学概论》,接受了胡适等人重视汉乐府、民间文学的诗歌史地位的观点,强调乐府对建安诗歌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建安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事实,不在于结束古赋,结束四言,为五言立壁垒;而是乐府诗的大解放,也就是俗乐歌词登上了文人创作的大雅之堂。“建安文学是从乐府来的,而乐府的发生,却是从民间孕育产生的。”他认为汉乐府有大半是平民文学,而建安文学又源于乐府,因此建安文学的民俗化、白话化,已是必然的结果。“只是中国的文学,一向都被看作贵族的装饰品,这种反动,就有研究和重视的价值了。”(沈达材5)作者的这种史观,是受五四以后重视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观念影响,但是基本符合文学史的实绩,而作者的叙述也趋于翔实。但是作者对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关系,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觉得纯粹的民间文学,其始不过是具着粗鄙的词句,真挚的情调,并没有什么绮丽的、曲折的文学描写。必要到了当代文人士采用了这些民间歌曲,而自己去制造新词时,于是文学的黄金时期便到临了。所谓建安文学史,盖即这种文学史上的黄金期产物之一。”同时沈氏还指出建安“时代的文学观念仍注重于辞赋,诗歌的勃兴,不过是偶然的事吧了。”(沈达材76)这也比较合理地把握住了建安文学的整体构成。从胡适之的片面观点,到沈达材这样的比较辩证地认识所谓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关系,是学术上有价值的扬弃。稍后的1936年出版的郭伯恭的

《魏晋诗歌概论》是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魏晋诗歌发展历史的专著,作者从魏晋的历史背景与文学思潮中考察魏晋诗歌的发展历史,对五言诗的起源与建安五言腾踊的现象,较钟、刘两人有更加详细的叙述。郭著在讨论魏晋诗歌史的发生起源时,也强调乐府的影响。“建安诗歌的重要特点,并不在结束四言诗,扩展五言诗的另一领域,它在积极方面的表现,更是乐府的解放。这在东汉诗人已开其端,到这时候乐府的影响已深入了,于是建安诗人就公然出来以乐府的旧曲制作新辞,而且不为乐律所束缚,自由朴实,很能表现出各个人的真情来,这是建安时代的特有精神,也是建安诗坛的新局面。”(郭伯恭 21)又如一些论断上,郭著也吸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念,如称“太康诗坛是沿着曹魏以来的浪漫思潮而进展”(郭伯恭 25),用浪漫主义来概括建安以来的诗风,也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诗史观。又如作者在观念上贬低以华缙风格与客观描写的辞赋,而重视新兴的五言诗。这反映五四以来的重视抒情文学的观念,一定程度偏离了清末至刘师培一派重视辞章的文学观念。与沈著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倾向。对魏晋诗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郭著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古体诗时代”:“魏晋诗歌,经批评家公认为古体诗的黄金时代。所谓‘古体诗’,原是与‘近体诗’相对待的名词。近体诗就是律诗和绝句,有一定的格律,以五言、七言为限,凡不守律诗和绝句的格律的诗,都叫做‘古体诗’或简称‘古诗’。这种分别是颇合理的,我们在这里可得着一个很确实的观念,并且由此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划出一个很分明的时代来。我们知道近体诗是六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创始的,在六朝以前,完全是古体诗流行的时代;这个时代,上自《诗经》的无名氏诗人起,下至晋末大诗人陶渊明止,我们可以称为古体诗的时代。”(郭伯恭 181)作者对古体诗时代与近体诗时代的区分,是比较粗糙的,并且将诗经与汉魏乐府诗、五言诗合为一谈,也不甚科学。其考证源流演变,亦未见精细。但还是揭示了诗歌史的一个大流变的。这种研究,比起那种完全使用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等观念对文学史做削足适履式的截割,是更加学术化了。可见一种文学史研究,其起初可能是观念强横地干预文学史的建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会越来越向事实靠近,这时候,文学史研究的品质也开始提高。就汉魏六朝诗歌史来说,从最初基本上在旧学的语境中勾勒诗史,并且其准确、详尽尚且不如明清诗史家,到刘师培融旧学与新知,以扬州学派的文学观为灵魂,初步建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系统叙述的结构,是一个变化。在具体的研究上,郭著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建安、正始、太康、玄言诗盛行这样一个诗史建构,其对魏晋诗歌之流变有较好的揭示,如其论建安之太康诗风的演变“太康诗坛是沿着曹魏以来的浪漫思潮而进展,建安诗人已对于修辞有了相当的注意,正始时代虽略起了反动,可是到了晋代,因为当时的文人受辞赋的影响很深,所以就倾向骈俪的体裁,特别趋重在诗的外形之巧,而忽略了诗的内质之美。”(郭伯恭 25)同时作者还注意到模拟、写景这些艺术因素的发展,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魏晋诗歌发展的脉络,对传统的魏晋诗歌研究有所深化。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学、平民文学观念中的中古诗史建构,对汉魏六朝诗史的建构也是关键。但是此后的宿学与新秀,虽然深受此观念的影响,却舍弃了胡氏的片面性,重新回归对中古诗歌的事实全面掌握,并在这个过程中,对钟、刘直到明清诗史家的研究重新加以关注,以其为自身研究的出发点,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的逐渐走向成熟。

四

二十世纪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史观,即“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的理论。1927年,鲁迅先生在广州暑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就是对二十世纪的汉魏六朝文化及文学的研究影响极为深远的经典文献。他着眼于汉魏之际的思想环境与文学的发展,依据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之说,认为“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 526)所谓文学自觉,在鲁迅的语境中,包含对纯文学的肯定以及强调文学独立于各种功利性的社会价值的、以表现主观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为其唯一的价值这样一些内容在里面。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所有论述,都是着眼于上述视角的,如其对建安通脱壮丽文风的论述,对魏晋风度及陶渊明个性的论述。鲁迅这篇论文对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影响之大,实际上远远超过胡适之、郑振铎诸家。但从晚清以来的文学史观的发展来看,鲁迅之所以能形成他自己如此独特的、穿透力极强的汉魏六朝文学史观,与晚清文学史家努力寻找文学的内涵、尤其是重视在中国古代广阔的著述体系中寻找纯文学的内涵是分不开的。另外,鲁迅在文学史上,其实也是属于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六朝派的。在这个讲演中,鲁迅对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极为推重,其关于建安文学通脱壮丽的论述,也是踵承刘的观点的。他的魏晋文学自觉说,与刘师培的着眼于六朝文笔之分的“文学辨体”学说也有渊源的关系。刘氏借用文笔之说,来界定文学的内涵,代表晚清以来寻找纯文学内涵的一种论述方式。其《中古文学史讲义》正是寻找从汉到齐梁陈时代纯文学、或称修辞主义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并且以汉魏之际为此一文学史发展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是对刘氏文学观的一种发展。但他自己将其表述为西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观。传统“文笔论”中和“笔”相对称的“文”,正是文学写作外在功用价值的脱落,纯艺术性质的突出。从文学发展史来看,鲁迅所说的汉魏之际的文学独立,还包含着文学从经学与重视教化的汉代文化中,独立到重视文学自身价值,消解其教化功能这一层意思。从某种程度上

看,这也是晚清以来文学史家逐渐摆脱经史及儒家教化的集体努力的结果。在另一方面,他对自我意识的强调,即被后人概括为与“文的自觉”相对的“人的自觉”,更是受到五四以来的思潮的明显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所取得的成就,是对晚清以来的文学史思考的一个发展,并非个人一时兴到之言。另外,鲁迅重新激活了传统的“魏晋风度”这一概念,带出了人们对与之相关的魏晋文化的特征的重新认识。我们前面讲过,五四新文学建立起平民文学的观念,在此视野中,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文学的地位被相当程度地忽略。鲁迅的魏晋风度概念,以及他对魏晋士人精神世界的触及,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寻找到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此后,通过对魏晋士人精神世界的研究来展现其文学的表现,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在这样的视野下,二十世纪的魏晋南北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开始形成,如建安风骨、正始风流、玄言文学、山水文学、宫体文学等,都被贯穿在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的文学史建构中来认识,促使了针对上述专题研究的深入。同样,士族文化与汉魏六朝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是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点。但是客观来讲,相对史学界对这个专题研究的深入,文学史界对士族与六朝文学关系的研究,除了若干个案的阐释稍有定论外,整体研究的成就是不太起眼的。

鲁迅的魏晋文学史观及一系列具体观点,造成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新起点。他从思想史、生活史、精神史出发来阐述文学史的做法,对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的影响是很大的。完成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可以说是这一派的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实绩性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从鲁迅的观点出发所做出的王瑶式的六朝文学史体系。如果相对于解放后纯粹的马列史观的文学阐述(这种阐述也是渊源于五四),我们可以看到,王瑶源于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奇迹般地超越了阶级分析的研究方式,保持了晚清以来文学史研究独立思考的立场。从这个角度上说,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无疑是刘师培、鲁迅的有力的继承者。不仅是王瑶,即使著述于建国后的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在阐述魏晋文学的时候,也还是沿用了文学自觉说,“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游国恩 226)可见,在阶级分析一统天下的时期,鲁迅的文学自觉观点,仍在发生理论上的作用。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在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中的地位。但“文学自觉”对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仍决定于其对文学史事实揭示的功用。

五

在新的教学与学术体制中,二十世纪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的一大实绩,就是各种专题研究的模式的建立。早期诸大家的汉魏六朝诸家研究,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后来诸家有发凡起例的作用。所以,经过早期宏观、长时段的文学史叙述后,一些专门、专家的研究也由此推出。如据杨亮功之回忆,刘师培在教授中古文学史课时,曾指导学生选择中古文学家作专门的研究,“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杨亮功 661)同样,黄节在北大文学院(1917年)、清华文科研究所(1928年)任教期间,讲授汉魏六朝专家诗及《汉魏乐府风笺》,不仅其本身的成果代表了旧学出新知一派的实绩,同时也开出了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的新风气。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前期像黄节的这样的学者,除受朴学影响较深外,也多少融入了近代的眼光,“如黄节的作品笺注,功力未必能赶上干、嘉诸老,但在通达方面则颇有所过之,是为得益于近代的理性和理解力。另外,黄节等选择魏晋南北朝作家作为笺注对象,实际上已经舍弃了经学的陈腐传统,本身就含有一定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吴云 7-8)这一看法是允当的。正是从五四新文学观念中兴起的重视歌谣、民间文学的风气,与黄节等从旧学范畴出发的强调汉魏乐府的“风”的性质的观念正相交汇,由此形成了中古诗歌史研究中成就比较突出的乐府诗研究的风气,其在二十世纪中古诗研究中实绩最大。主要的实绩,即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和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33年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这两部著作。1927年考取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罗根泽,先从梁启超治诸子学,后又研究批评史与乐府文学史,并在1930年撰写出《乐府文学史》,显然也是受黄节、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乐府文学史研究,除了综述古代乐府学之外,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有所深化,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如关于清商三调与相和歌辞的分合关系的讨论,是一个很深入的专题。这个问题本身虽然迄今仍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显然刺激起乐府研究的兴趣。一般的文学史专著与文学史教材中,对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研究,也开始占据很大比例,如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第四篇《乐府》,都是这个时期研究乐府的实绩。但是这些有关乐府的研究,其实是郭茂倩《乐府诗集》、郑樵《通志·乐略》为基本的文献来源和分类依据的,没有超出以郭、郑为代表的古代乐府研究的范畴。其对郭、郑的观点的质疑,如梁启超认为清商三调与相和原为两类,沈约《乐志》、王僧虔《技录》都是这样著录的,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将三调归属相和,而郭茂倩、郑樵沿其误,将汉魏时期的清商三调歌诗归入“相和曲辞”一类中,梁氏认为是“替清商割地”(梁启超 56)。这是对乐府分类研究的深入。但是梁氏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这里涉及到

对文献的理解与乐府音乐内部分类及历史沿变的不同认识,所以朱自清等人不同意梁氏观点,引起作为二十世纪乐府研究热点问题的清商三调与相和曲辞归属问题的持续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对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特殊关注,是新文学中重视民间文学、歌谣、抒情乐歌等新观念对中国古代乐府研究传统的一个激活。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批在清华、北大国文系以及清华文科研究所毕业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比较专深的学术研究,其中研究诗歌史的如余冠英、逯钦立,其重点多在汉魏六朝的诗歌史。这些研究开始体现专家研究的水准,如在乐府研究方面,他们在比较充分地掌握史料、比较全面地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学术知识之外,在乐府的音乐体制、文献整理以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价值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余冠英的《乐府诗选》,是继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之后的重要选本,是五十至八十年代学习、研究乐府诗的重要文本之一。在具体学术观点方面,余氏能比较准确地吸收传统乐府学研究的成果,而对采诗制度作了较好的梳理,他认为汉武帝时“采诗夜诵”(《汉书·礼乐志》)就是采集民歌,包括歌辞与乐调。传统对采诗的理解比较模糊,大体只知道是采集作品,余氏指出包括采乐调,这是符合音乐史的事实的,对我们理解汉武采诗的真相有启发。余氏还勾沉相关史料,指出东汉时期也有采诗,“东汉乐府是否恢复刘彻时代的规模制度,史无明文,但现存古民间乐府诗许多是东汉的,可能东汉的乐府是采诗的,至少东汉政府曾为了政治目的访听歌谣。”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不废,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旧的乐府歌辞,有些还被继续用着,因而两汉的民歌流传了一部分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到沈约著《宋书》,又载入《乐志》。“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民歌俗曲又一次被上层阶级所采取传习,不过范围只限于城市,内容又不外乎恋情,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比。”“后魏从开国之初就有乐府。那时北方战争频繁,似乎不会有采诗的事。但‘横吹曲辞’确乎多是民谣,传入梁朝,被转译保存,流传到现在。”“从上述事实看来,汉、魏、六朝民歌的写定和保存,主要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但由于私家肄习,民间传唱而流传的大约也不少。”(余冠英4-5)像上述这样通过全面的掌握史料与复原史实得出来的结论,代表了一种求实的史学风格。此外,余氏《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以及《七言诗起源新论》等文章,也都是从平正求实中获得新知,代表了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的研究风格。逯钦立1936年至193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37年6月以北京大学学籍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论文题目为《相和歌词考》,1943年以《乐府相和歌考证》为题刊于《读书通讯》第六十三、六十四期,又于1982年以《相和歌曲调考》为题发表于中华书局《文史》第十四卷。这篇论文,对近人梁启超的清商三调不隶相和歌辞的观点提出异议,从梳理历代著录相和歌词、清商三调的文献出发,指出王僧虔《技录》已以清商三调属相和,又进一步从曲调制作、演奏形式出发,认为清商三调仍属相和歌,但它们是相和歌的变种。他提出清商三调是魏代的产物,这是在乐府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从汉到魏晋,乐府音乐是有所演变的。而从前的史料记载汉魏乐府演变的,只有《宋书·乐志》记载的魏明帝分相和为两部,“清商三调,荀勗撰旧词施用者”,以及刘勰认为“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这几条记载,后人于此也颇少考论。逯氏第一次对汉魏之际乐府音乐体制演变进行考证,实开后来考证乐府音乐体制之先河。又逯钦立1945年所作的《汉诗别录》中,也多考证汉乐府诗歌的文辞。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体现了他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的成果。从三十年代演至四十、甚至五十年代的乐府研究的殿军人物,应该是王运熙先生,他可以是二十世纪乐府研究史的承续性人物。王运熙五十年代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正是强调乐府为民歌这一五四以来的乐府研究新视点的继承,但同时王氏的研究对诸如汉魏乐府的音乐体制也做了研究,其贡献最大处为对汉魏晋乐府机构的演变的研究。其对吴声西曲的研究,则多侧重于其诗歌形式、内容及修辞艺术的研究。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乐府诗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取得若干进展的,也主要对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价值的阐释。乐府诗研究传统的恢复是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一时期研究的最大的特点的是对乐府诗原生的音乐、娱乐体制的重视,由此出发,汉魏六朝乐府诗发生的音乐与娱乐文化背景、乐府制度、音乐演奏体制、及歌曲本身,都得到了重视。这一研究趋势现在尚处于方兴未艾的态势中。

二十世纪前半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成绩也比较突出。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积淀之丰厚,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的文学观之建立,其中如进化论、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等观念影响尤巨。学者们正是由于这些观念而获得了重新建构、阐释汉魏六朝诗歌史的话语体系,这其间也的确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或者对那些被以往的旧文学史观所忽略的事实重新进行阐述,形成了像乐府诗研究这样的热点。但我们也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事实本身在不断地调整研究者的观念与方法,促使他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汉魏六朝诗歌史的整体,并且不断地与旧学的结论呼应,甚至出现向传统方法的回归,如刘师培、黄节、刘永济、钱基博诸家,放弃晚清以来流行的文学史叙述体系,从钟、刘、胡、许及干嘉注疏之学中发展出一种述作兼顾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在这一方式中,旧学与新知、述与作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不失为著述文学史的良法。近年初版的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长编》以及各家的文学编年史,在方法也与上述诸家有所接近,但基本上是编纂旧说,罗列事实,只可视为一种文学史料,不能看做是文学史的著作。总之,文学史研究如何融汇中西,沟通新旧,在继承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有力的发展,是今后的文学史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Chen, Pingyuan. *Literary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陈子昂《修竹篇序》,中华书局编《陈子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Chen, Zi'ang. *A Collection of Chen Zi'a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ed.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 [Guo, Bogon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Poetry of Wei and Ji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6.]
- 郭绍虞等编《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Guo, Shaoyu. et al. *The Sequel of Remarks on Poetry of Qing*, vol. 2.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1980.]
- 黄遵宪著,钱钟联笺注《入境庐诗草笺注·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Huang, Zunxian. *Annotated Renjinglu Poetry*. Annotated. Qian Zhonglia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1981.]
-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47年。
- [Hu, Yunyi.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Shanghai: Beixin Publishing House, 1947.]
- 黄庭坚《胡宗元诗集序》四部丛刊本《重刻黄文节山谷先生文集》。
- [Huang, Tingjian. "Preface to *The Collected Poems of Hu Zongyuan*." *Reprinted Anthology of Huang Tingjian, Sibü Congkan*]n. d.
- 蒋鉴璋《中国文学史纲》。上海:亚细亚书局,民国十九年版。
- [Jiang, Jianzhang. *An Outline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Shanghai: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30.]
- 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绪言》。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
- [Lai, Yuxun. Prefac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 [Liang, Qichao. *Chinese Belles Lettres and Its History*. Shanghai: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1936.]
-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Liu Xie. *A Serious and Elegant Treatise on Literature*. Noted by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58.]
- 鲁迅《鲁迅全集·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5.]
- 钱志熙“文人文学的发生与早期文人群体的阶层特征”,《北京大学学报》5(2009):43-54。
- [Qian, Zhixi.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ti Literature and Features of Early Literati."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vol. 5 (2009): 43-54.]
- 沈炳华《建安文学概论》序,载沈达材著《建安文学概论》卷首。北京:北平景山东街补社,中华民国21年(1921年)
- [Shen, Binghua. "Prefa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in Jian'an Period*. By Shen Dacai. Beijing: Jingshan Dongjie Pushe, 1921.]
-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Shen, Deqian. *A Selection of Tang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1978.]
-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
- [Tan, Zhengbi.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Guangming Publishing House, 1933.]
- 吴云等著,徐公持执笔《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绪论》。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Wu, Yun. et al. *A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220-581*. Beijing: Beijing People's Press, 2001.]
-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 [Yan, Yu. *Canglang's Remarks on Poetr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61.]
-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
- [Yang, Lianggong. *My Three Decades of Teaching Career*.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8.]
- 余冠英《乐府诗选》序,《汉魏六朝诗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据中华书局1962年版排印本。
- [Yu, Guangying. "Preface to A Selection of Yue fu Poetry" in *Essays o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Poetr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 赵师秀等《永嘉四灵诗集·清苑斋诗集补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 [Zhao, Shixiu. et al. *Poetry by the Four Yongjia Talents*. Hangzhou: Zhejiang Guji Publishing House, 1985.]

(责任编辑:查正贤)